

巴甫洛夫
高級神經活動雜誌

譯叢



第六專輯

人民衛生出版社

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庫帕洛夫 (П. С. Купалов)

副主編 沃洛霍夫 (А. А. Волохов)

委 員 阿斯拉羌 (Э. А. Асратян)

貝柯夫 (К. М. Быков)

沃羅寧 (Л. Г. Воронин)

卡薩特金 (Н. И. Касаткин)

魯希諾夫 (В. С. Русинов)

薩爾基索夫 (С. А. Саркисов)

(根據“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1956年第1期的編輯委員會名單)

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譯叢編輯委員會

主任 趙以炳

副主任 丁 琛 張錫鈞

常務委員 季鍾樸 徐誦明 劉思職 劉 永 王志均 周金黃

委 員 丁 琛 王志均 伍正誼 朱濱生 沈震春 沈雋淇 汪埜仁 季鍾樸

易見龍 林樹模 吳 襄 周金黃 胡正詳 徐誦明 徐豐彥 侯宗濂

孫國華 陳應謙 馮德培 張錫鈞 張昌紹 楊恩孚 趙以炳 闡德潤

劉思職 劉 永 劉士豪 劉載生 諸相堯 蔡 魁 龍叔修

(委員姓名以筆畫為序)

巴甫洛夫
高級神經活動雜誌
譯叢

第六專輯

書號：1264 開本：787×1092/16

印張：19 1/4 字數：466千字

195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編輯者·

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譯叢
編輯委員會

北京崇文區鈕子胡同 36 號

·出版者·

人民衛生出版社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北京崇文區鈕子胡同 36 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廠

北京佟麟閣路 71 號

印数：1—1,600

定價(9)2.20元

巴甫洛夫
高級神經活動雜誌
譯叢

第六專輯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目錄

巴甫洛夫的科學思想在神經病理學和精神病學中的發展	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著	李心天譯 (1)
精神病理現象的神經動力學分析	祖拉巴施維里著	龍式昭譯 (9)
在精神性反應的臨牀上研究超常相的經驗	克爾比科夫、克雷洛夫著	叶毓衡譯 (16)
超反常相是精神病患者某些精神病理現象的基礎	拉比茨基著	唐秋玲譯 (24)
反應性抑鬱症患者大腦皮層的時相狀態	加爾茨什坦著	單守諱譯 (27)
論反應性抑鬱症時第一和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障礙	加爾茨什坦著	凌治鏞譯 (36)
反應性抑鬱症時延長性睡眠對兩信號系統協同活動障礙以及與此有關的心臟血管活動改變的影響	加爾茨什坦著 趙傳繹、段淑貞譯	(52)
在精神分裂症急性期中皮層活動及兩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特徵	多布爾然斯·姬著	秦芝九譯 (68)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臨床病程中第一和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實驗性研究經驗	維諾哥拉多夫、列伊謝爾著	秦芝九譯 (76)
關於兒童痴呆綜合病征中第一和第二信號系統的協同活動的某些障礙	吐羅娃著	曹天祥譯 (90)
關於健康老年人和老年性精神病患者兩種信號系統的誘導性相互關係的研究	烏索夫著	許淑蓮譯 (103)
癲癇發作對於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的條件聯繫和非條件聯繩的影響	謝列基娜著	滕錫衡譯 (111)
在癲癇發作的病理解剖學中興奮與抑制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謝爾維特著	滕錫衡譯 (123)
慢性酒精中毒時第一和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某些障礙	辛克維奇著	秦曉譯 (127)
酒精中毒性譴妄 (露顛性譴妄) 情況下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協同活動的實驗臨床研究	謝列基娜著	黃倩霞譯 (134)
在催眠的夢遊時相中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的相互作用問題 (報導 I)	巴甫洛夫、鮑沃林斯基著	凌治鏞譯 (151)
在催眠的夢遊時相中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的相互作用問題 (報導 II)	巴甫洛夫等著	凌治鏞譯 (160)
在催眠的夢遊時相中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研究	科羅特金、蘇斯洛娃著	詹 錦譯 (166)
在催眠和催眠後狀態下兩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某些特點	科羅特金、蘇斯洛娃著	彭祥鄂譯 (171)
歇斯底里患者催眠後狀態的神經機制的研究材料	科羅特金、蘇斯洛娃著 廉琦華、李子瑜譯	(179)
論歇斯底里性癲癇的某些病理生理機制	普羅霍羅娃著	劉鍾毅譯 (188)
伊村科·庫興氏病的高級神經活動 (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 的研究	多布爾然斯·姬著	夏銀夷譯 (194)
精神發育不全和老年性痴呆患者高級神經活動障礙的比較性研究的經驗	加克爾著 郭兆貴、李云霞譯	(202)
論運動性失語症時高級神經活動的障礙	頓柯諾吉著	李子瑜譯 (208)
科爾薩科夫綜合病症患者建立條件反射的問題	林斯基著	劉鍾毅譯 (216)
強迫狀態時血管反應的神經動力學	謝列布利亞科娃著 和平醫院翻譯室譯	(223)
從病理生理學觀點理解急性感染性精神病的一些資料	齊斯托維奇著	湯明昭譯 (228)
關於胰島素休克療法的過程中妄想、大腦自動症症狀和某些幻覺的生理學研究	巴洛諾夫、李奇柯著	滕錫衡譯 (233)
精神病學與神經病學中的保護性抑制與治療性睡眠	斯特列爾邱克著	范兆昀譯 (242)
從巴甫洛夫兩信號系統學說的觀點論分別性的催眠療法的經驗	斯特列爾邱克著	韓 銳譯 (248)
睡眠療法在神經病臨牀上的應用經驗	亞歷山大羅娃、普羅霍羅娃著	李延增譯 (260)
中樞神經系統器質性損傷的後遺症的實驗性睡眠療法	阿斯拉羌著	張永和譯 (272)
用腦電波描記法對發作性睡眠患者的睡眠的研究	馬連尼娜著	錢紹禎譯 (283)
催眠時實驗性語言障礙的研究	馬堯洛夫、蘇斯洛娃著	姜鈞章譯 (286)
利用體積描記法檢查精神病患者高級神經活動的某些特點	列伊斯爾著	梅懋華譯 (290)
研究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高級神經活動的複合方法的方案	烏索夫著 文 凡譯	(291)
精神病患者音語條件聯繩研究的幾種方法	普洛季切爾著	詹 錦譯 (299)
用實驗室語言 (人工語言、實驗性語言、新造語言) 方法來研究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的相互作用	羅羅米爾·格爾別克著	翁禹声譯 (309)

巴甫洛夫的科学思想在神經病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發展

原載“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1951年第6期

伊万諾夫-斯莫連斯基 (А. Г. Иванов-Смоленский) (莫斯科)

大家知道，巴甫洛夫还在他的科学活动的早期，当他在血液循环生理学方面工作时，已經在他的实验研究最初阶段中就把自己的研究与医学，即与内科临床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并經常将自己的研究与心臟血管疾患的病理生理学和治疗学諸問題相联系。同时形成了“將神經系統的影响推广到尽可能多的机体的各种活动上”(註1)这样的牢固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巴甫洛夫的全部科学活动中从未离开过他；換言之，即确定了被称为神經論的生理学路綫，后者也逐渐地推广到病理生理学的領域中来了。

巴甫洛夫对消化道活动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在他的主要消化腺研究講义中，他經常提到飲食学、飲食制度，消化过程紊乱的預防与治疗諸問題。就在第一章中，他指出：“飲食学即使不是在自己一般的經驗基础方面，那末在說明与分析方面也是治疗学中的一个最混乱的章节”(註2)。他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要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一个章节。在最后一講中几乎整个都是說明消化腺生理学与消化过程紊乱临床的关系的一些問題。

大家也都知道，巴甫洛夫在其消化道活动的生理学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神經系統对这一活动的影响。

然而，可以完全有根据的說，神經論的思想在巴甫洛夫及其学派的以下这些研究中达到了發展的最高度，这些研究指出了神經系統对整个机体活动的影响，整体机体在外界环境中的平衡，同时指出了在机体与周圍环境最精确和最复杂的相互作用上腦的高級部位的作用和意义。

在巴甫洛夫进入当时对他来講还是新的科学領域的时候，他曾这样写道：在他面前展开了“無限的富有成效的研究領域，即神經系統生理学的第二个巨大部門——这个神經系統，主要确立的不是机体各部分之間的相互关系（直到現在为止我們主要研究了这一相互关系），而是机体与周圍环境的相互关系”(註3)。

然而巴甫洛夫进入这新的領域以后，克服了其中由于研究对象的巨大复杂性而引起的重大困难，他不間断地工作了三十五年，在这期間巴甫洛夫始終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生理学和医学不可分离的原則。

早在第一篇說明当时还剛誕生的条件反射學說的文章中，巴甫洛夫就已談到，在这一新的領域內的研究將成为未来的而且“他深信已經是为期不远的實驗性精神病理学”(註4)。

可是，如以后所表明的，从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發表的大量實驗工作（主要是学位論文）及以

(註1) 巴甫洛夫全集，卷1，第142頁，1940年版。

(註2) 巴甫洛夫全集，卷2，第22頁，1946年版。

(註3) 巴甫洛夫，动物高級神經活動（行為）的二十年客觀研究的經驗，第6版，1938年，第25頁。

(註4) 同上，第34頁。

結合应用手术摘除方法和条件反射方法而进行的工作,不仅仅涉及到“实验性精神病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問題,而且对于神經病理学——中樞神經系統器質性疾患的临床亦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一系列工作作为机能的动力定位这一新的学說奠定了基础,并且根据新的观点阐明了有关腦的器質性損伤病灶的診斷的許多問題。

这样來說未必会言过其实的,即这里所提到的研究促使神經病理学家和神經外科学家在解决腦器官方面的临床困难問題时,广泛地利用了在高等动物身上造成的这些問題的实验模型,并且严格地遵循着客觀的研究方法。但是应当承認,巴甫洛夫及其学派的这些研究資料对临床学的意义不是馬上就得到应有的評价的。

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本人的某些書面的叙述表明,他認為在这方面按客觀的方法进行有計劃的研究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这样,还在第一篇关于条件反射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們已經知道,在切除动物的大腦半球或者大腦半球的某些部分时,动物的适应能力就会受到很显著的限制。可是对这一題目的研究还不曾成为一个特殊的部門,以便使这研究能按照一定的計劃不断地發展起来。我認為这是由于:直到現在为止,在研究者們的手里还没有关于动物和周圍环境之間正常关系的比較充分的、詳細的資料,因此也就不足以对手术前后的动物状态进行客觀的精确的比較。”(註)

巴甫洛夫学派进一步的研究在頗大的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不仅对于腦的高級部位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的临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 * *

可是,巴甫洛夫及其学生們在动物实验性中樞神經系統机能疾患,即被称为“实验性神經官能症”方面的很多工作,对这两个临床来講,未必具有較小的意义,而且在許多情况下,这些机能疾患超出了神經官能症概念的范围。或者較正确地說,超出了神經官能症模型的范围,常常成为精神病或者心因性軀体疾患的模型。

在这一方面,彼得罗娃、烏希也維奇和多林諸氏的研究是值得特別注意的,这些研究的价值不仅对于神經精神病临床,而且对于內科临床也是無可爭辯的。

在实验室內引起的动物实验性中樞神經系統机能疾患不仅是神經官能症的模型,而且对于了解人类所特有的、作为各种神經精神病的基础的發病学的神經机制來說也具有較普遍的意义,这种情况在巴甫洛夫本人是很清楚的。

例如,他在自己最后一些工作的某一篇工作中这样講道:“如果把我們所引起的神經病理状态运用到人类身上的話,則有很大一部分是与所謂的心因性疾患相符合的。”

大家知道,在研究动物因高級神經活动过度緊張、冲突、破裂而引起的神經系統机能性疾患方面的实验工作,使得巴甫洛夫去研究腦的临床病理生理学的問題,并且产生了在他的实验室內(1931)建立普通神經官能症病院和精神病院的动机。

但是必須記得,在更早的时期內巴甫洛夫即对精神病学問題發生了兴趣,并因此而去探訪精神病院。

(註) 巴甫洛夫,动物高級神經活動(行为)的二十年客觀研究的經驗,第6版,1938年,第35頁。

巴甫洛夫(1919年)在“精神病学是大腦半球生理学的助手”一文中写道：“从我早期关于血液循环与消化的研究中，我就已經確信临床上的錯綜复杂的現象——即机体机能的無穷尽的各种各样的病理变化和复合——对于用生理学思維方式来認識問題，有很大帮助。所以在我研究大腦半球生理学的許多年来，我早已不止一次地想利用精神病現象这一領域作为研究这一方面生理学的輔助分析材料。与我們所研究的机制的复杂性与精微性比較起来，作为一个分析的手段，破坏部分腦髓的方法是粗糙得可怕的，实际上不用这个粗糙的方法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期望：因为病理的因素有时可达到非常高度的分化，所以就使腦髓的完整机能更鮮明、更清楚、更精微地分解为各个要素，使腦髓的个别机能划分界限。1918年夏，我終于有机会与可能来研究数十例精神病人的病情。据我看来，我昔日的希望并未落空。一部分情况是我看到了多少已經为生理学所闡明了的論点得到了壯丽的示范，另一部分情况对我來說来是意味着腦髓活动的新的方面，它提出了新的問題，也为实验室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任务。但是我对于精神病材料的态度与專家的通常的态度是显著不同的。由于事先多年实验室的实践和思考，使我在一定的方向上始終坚持了純粹的生理学观点，使自己經常用一定的生理学的概念与語詞来表达病人的精神活动。当我的注意力停留在不是病人主觀状态的細节上而是病人的某些狀況的主要特征和現象上时，那末这对我來說就不成为什么特別的困难了。”(註1)

从剛才举出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巴甫洛夫早就注意到“精神病現象”这一部分。同时很有趣的是，他終于获得詳細地了解这些現象的可能性，在对病人的态度上他完全保持着为他所創立的严格的客觀研究方法。他不满意对他所見到的临床病象作一般的精神病理学的解釋，而力圖以病理生理学的角度，以高級神經過程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規律性失調的观点，以被研究病人的腦各部分間的神經动力学的相互关系障碍的观点，同时經常依靠自己在 动物高級神經 活动 实驗研究方面的丰富的实验室經驗，来了解这些病象。

然而在应用客觀的神經动力学方法去研究病人的最初嘗試中，在对神經精神疾患作病理生理分析的最初嘗試中，巴甫洛夫只認為，这是研究中樞神經系統高級部位活動时获得輔助分析材料的一种手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精神病学对他來說仅是大腦半球生理学的“助手”罢了。

* * *

經過了17年——巴甫洛夫的实验室进行了用人工方法引起动物腦的机能性疾患的巨大研究工作。与这些病变的病理生理学紧密联系的是探究了它的實驗性治疗(小剂量的溴剂，溴与咖啡鹼合用、等等)。按照巴甫洛夫的願望，在其实验室里建立了專門的病院，現在巴甫洛夫重新又回到关于生理实验室与临床的相互关系的問題上来了，他在1934年写道：“因为我觉得我們的資料似乎对从生理学观点理解若干神經疾患的机制來說已經是足够的了，所以我在2~3年前就开始探訪……神經病和精神病的临床。并且可以說，談到神經病临床时，几乎一切在这里所觀察到的神經官能症症狀和病象都是可能理解的，并且都是可能和我們病理生理实验室的諸事实联系起来的。”(註2)

在另一处写道：“在結語中，我要簡略地說到我們实验室的資料运用到神經病学 和 精神病

(註1) 巴甫洛夫，动物高級神經活動(行为)二十年客觀研究的經驗，第6版，1938年，第349頁—350頁。

(註2) 巴甫洛夫，动物高級神經活動(行为)二十年客觀研究的經驗，第6版，1938年，第689頁。

學臨床上去的問題。至于談到神經病學臨床方面，則毫無疑問的，根據實驗室的分析能十分滿意地理解我們人類的神經官能症；而且據我看來，由於我們實驗室的材料使精神病學中的某些問題變得明朗化了。”（註）

可以有充分的根據說：當揭露了各種神經和精神狀態的發病學的神經機制，研究了作為這些狀態的基礎的神經動力學的病理性失調，促使擬定了對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的發病學治療方法時（小劑量溴劑、溴和咖啡鹼結合使用，睡眠療法等等），在目前階段已經不是精神病學為大腦半球生理學的助手，而相反的是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和病理生理學成為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的助手了。

巴甫洛夫到臨床醫院來時，廣泛地利用了既往病歷的材料，發現他所研究的病人的生活史和患病史以及社會環境的特點。巴甫洛夫對一切臨床檢查的材料和臨床觀察材料都感到興趣，他以高度的熱忱、誠懇和機智與病人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對病院中病人的生活條件、護理和治療諸問題予以最熱忱的關切。

然而對病人行為和言論的病理心理學解釋，在病人內部精神狀態的特點中來尋找對這些行為和言論的充分解釋的一切努力，皆不能令巴甫洛夫滿意，他總是力求了解疾病發生的原因，疾病發生和發展的神經機制，神經過程的運動和相互作用的病理變化，以及作為疾病基礎的腦的各部位和各系統的相互關係。

他力求在疾病的現象中把致病及有害因子作用的直接表現與機體自衛適應的表現、神經系統保護性反性的表現區分開來，後者是應當盡力促進並必須從各方面加強的。

我們這裡不準備談巴甫洛夫在精神分裂症、歇斯底里、精神衰弱、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妄想狂等方面本來就享有盛名的研究。

在了解疾病原因，其神經機制以及表現在病象中的保護性機能時，巴甫洛夫為治療學尋找科學根據。

在研究病人的態度上，如同以前在1918年第一次探訪精神病院時一樣，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用的是嚴格客觀的研究方法，不從病人內在的精神體驗中去尋覓對精神病理現象的解釋；而是在神經系統諸高級部位與外界環境，首先是與社會環境以及機體內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病理失調上，在神經動力學的病理失調上尋找解釋。但現在巴甫洛夫除了像早先那樣充分地保持嚴格客觀的神經動力學方法的觀點外，對高級神經活動的社會制約性及人類的特殊性質予以極大的注意。

正是在臨牀上，他產生了關於第一和第二信號系統，關於人腦“非常重要的附加物”、關於在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的臨床病理生理學研究時必須經常考慮到僅為人類所特有的高級神經活動特徵等這些卓越的思想。巴甫洛夫在1935年寫道：“由於比起高等動物來，我們的腦髓是非常複雜的緣故，所以應當有特殊的人類神經官能症，我將精神衰弱和歇斯底里列入人類的神經官能症之內去了。”

首先由巴甫洛夫在一般神經官能症中敘述的第一和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失調，以後在許多神經精神病中得到了研究。（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法捷耶娃，謝列基娜，加爾茨什坦，

（註）巴甫洛夫，動物高級神經活動（行為）二十年客觀研究的經驗，第6版，1938年，第698頁。

斯特列爾丘克,辛克維奇,斯特羅金娜等等)。

* * *

巴甫洛夫關於生理學、病理生理學和實驗治療學之間的不可分離性的科學思想，特別體現在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上，並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使實驗室與臨床形成最緊密的相互關係。

這樣，研究困難的(極大的)作業對動物高級神經活動的影響，其結果能認識實驗性神經官能症中存在的神經系統破裂、衝突、過度緊張等現象。實驗性神經官能症治療的成功經驗曾經運用到神經官能症的臨牀上，並用這樣的方法使實驗性治療方面的研究引用到臨床的治療上來。

在神經過度緊張、消耗以及手術創傷的條件下研究動物的保護性抑制現象，使得巴甫洛夫有可能了解和解釋許多複雜的臨牀現象(特別是精神分裂症)的神經機制。附屬於巴甫洛夫實驗室的、為本文作者所領導的精神病院，根據巴甫洛夫保護性抑制的概念，首先在這基礎上對具有明顯保護性抑制現象的精神分裂症綜合病征採用了長時間的睡眠療法，目的是在加強和加深保護性抑制的現象(註1)。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我們把出現在顱腦戰傷時(主要在所謂腦振盪和腦挫傷綜合病征時)的深漫性抑制的臨牀相了解為保護性抑制的表現，所以這種疾病從巴甫洛夫的睡眠療法中獲得良好的效果，多林和阿斯拉羌兩氏與我們無關地在動物和人身上進行的研究也証實了這一點(註2)。

以後以保護性抑制的概念為根據的睡眠療法在許多其他疾患中也得到了有成效的運用：如神經官能症(比爾曼)、麻醉劑癥(斯特列爾丘克)、反應性抑鬱症(加爾茨什坦)、等等。

如同我們所想的那樣，所引用的例子足夠清楚地說明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與病理生理學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它的病理狀態的實驗治療學與醫學實踐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

這種緊密聯繫，為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創立者本人所確定，並首先為他的學生們所擴大與鞏固。

這樣，我們看到巴甫洛夫在動物身上擬定的客觀神經動力學方法(而該方法以後加以必要的補充被應用到人身上來)，為實現他的生理學與醫學不可分離的思想開辟了新的道路。

巴甫洛夫說道：“在病理學範圍內，我們的研究方法，即對於高級神經活動諸現象採取客觀態度的方法，在動物身上被認為是正確的。並且，我們愈是試驗這方法，它就愈被認為是正確的。據我看來現在我們對於人類高級神經活動，即通常所稱的精神活動，也採取與上相同的态度，這已成為是合理的嘗試了。”(註3)

巴甫洛夫對於研究病人高級神經活動所採用的客觀神經動力學方法，不論在何種程度上均不取消臨床檢查的方法。相反，它把臨床檢查提到更高的階段。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臨床由於巴甫洛夫及其學派的工作，首先在中樞神經系統高級部位的病理生理學中獲得了新的強有力的支持。臨床記錄的資料現在能夠被用來為某些臨床事實作病理生理學的解釋，而對疾病神經機制的病理生理的理解自然是簡化了探討發病學治療的途徑。

三十多年來，巴甫洛夫在生理學實驗室內曾頑強地集中了自己的思想和科學研究工作。

(註1) 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蘇聯實驗醫學研究所通報，2~4號，1926年。

(註2) 在治療顱腦外傷時，我們使用了延長的自然睡眠，借催眠劑延長病人睡眠達每晝夜10~15小時。

(註3) 巴甫洛夫，動物高級神經活動(行為)二十年客觀研究的經驗，第6版，第699~700頁。

为不断地發展动物高級神經活動學說而努力。但是大家知道，仅是在其晚年才經常地探訪附屬於實驗室的專門病院，并动手建立了腦的臨床病理生理學，同时为精神病学和神經官能症學說奠定了新的基础。

* * *

当时巴甫洛夫的學生們与繼承者們（克拉斯諾果爾斯基、齊托維奇、伊万諾夫-斯莫連斯基、多林等等）以及別赫切列夫 及其學生們 曾探討了人类 高級神經活動研究方法 的各種變式（註1）。

这些變式中的某些方法（主要是運動方法，以及研究植物性條件反應的方法）还在巴甫洛夫生前在附屬於他的兩個病院（精神病和神經病病院）內的實驗室中就採用了。

主要在臨床或醫院的條件下开展的人類高級神經活動實驗研究的發展歷史大體上是這樣的：

1907年克拉斯諾果爾斯基在列寧格勒一所最古老的兒童醫院中首先進行了嬰兒大腦兩半球機能的實驗性研究，并為這個目的而擬定了專門的運動方法。在俄羅斯醫師學會的一次會議上所報告的這些試驗被巴甫洛夫敘述為“必需的和重要的”試驗（註2）。

1917年克拉斯諾果爾斯基在他的一个研究工作中对兒童神經官能症患者的高級神經活動實驗性研究作了總結，他从其中分出兴奋性增高反應型和惰性抑制反應型兩個类型。后来，他本人以及他的同事們曾进行了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症、白痴、癲癇、舞蹈症、粘液性水腫与佝僂病兒童的皮層活力失調的實驗性研究（沃洛維克 Воловик, 尤山科 ющенко, 德列夫施科娃 Деревщикова, 梅赫琴格爾 Мехкингер, 潘費羅夫 Панферов, 沙斯金 Щастин 等）。我們目前用分泌運動方法与紅外線照射法仍繼續这种研究。

在 1908~1909 年別赫切列夫与其同事們从事于称为結合反射的人类条件反射的研究。他开始与安菲莫夫(Анфимов), 斯皮爾托夫(Спиртов)及其他同事們一起拟定了呼吸 条件反射的研究方法，他們以尖銳的声音或疼痛刺激作为非条件刺激物。然而不久，他不满意这种研究方法，与莫洛特柯夫(A. Г. Молотков)一起，轉为研究运动性防御条件反射，以电刺激作为非条件刺激物用来刺激脚掌，可使脚从此專門裝置上縮回。

借助于这种方法（后来普羅托波波夫作了改良，提出了一种电刺激手指的裝置），进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性研究，首先在健康人（莫洛特柯夫，普拉托諾夫 К. П. Платонов, 舍瓦列夫 Е. А. Шевалев, 奇梅霍夫 А. М. Чмыхов 等），以后也在精神病病人身上（格列凱爾 Р. А. Грекер, 什尼爾曼 А. Л. Шнирман, 盧金娜 А. М. Лукина, 康托羅維奇 Н. В. Канторович 等）进行研究。

格列凱爾的学位論文“緊張症患者对接触的反应”是在精神病临床中对成年人进行的条件反射的最初的實驗性研究。如格列凱爾最初所指出的那样：緊張症患者在許多情况下不仅用电刺激皮肤来强化时不可能形成防御条件反射，而且也不能获得防御性非条件反射。在精神幼稚症与进行性麻痺的病人身上可用同样的方法看到形成条件反应的各种障碍（盧金娜, 什尼爾曼, 康托羅維奇）。不能不提到布魯施坦(C. A. Бруштейн)的学位論文，他研究了各种物理疗法对神經官能症病人条件反射的影响。

（註1）研究人类条件反射的許多實驗方法，也曾在国外提出，但我們不准备在本文中講到它们。

（註2）巴甫洛夫全集，卷 1 , 第 396 頁, 1940 年版。

在20~30年代，在烏克蘭精神病院內，別赫切列夫的最老的学生之一——普罗托波波夫和他的学生們(普魯先科Прусенко,波波夫Попов,塔塔連柯Татаренко等)用同样的电刺激皮膚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性研究。

1918年出版了齐托維奇的著作，叙述了他所拟訂的研究人类血管-运动 条件反射的 体 积 描記法。作者認為他的方法特別适宜于研究情緒状态，因此也适宜于研究情感範圍內的病理性失調。后来这一方法为貝柯夫和他的学生(特別是罗果夫)相当广泛地使用。当临幊上遇見具有心臟血管失調性質的一切病例时，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其效果是無庸置疑的。

1917年本文作者为研究所謂外伤性神經官能症时的条件联系时，曾利用广泛 流行在實驗心理学中的簡單的精神反应方法，后来我們作了某些改良，目前即为著名的 言語強化法，或簡單地說是言語法。用这种运动方法，与一切过去所叙述的方法相反，有可能在成人 和兒童的病人身上对任何信号(包括語詞的)与皮層性运动(我們習慣地称为隨意运动)之間的后天获得的暫時性条件联系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作者的同事們和作者自己都曾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了在大腦外伤性創傷、精神衰弱、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症、癫痫、反应状态、循环性精神病、进行性麻痺、精神幼稚症、麻醉剂癥等时的高級神經活動的各种失調(法捷耶娃，加爾茨什坦，雅邦策夫，鮑沃林斯基，斯特列尔丘克，米罗留波夫，辛克維奇，加克尔，謝列基娜，斯特罗金娜等)(註)。后来，为了研究各种神經精神病的皮層动力学失調，以及研究在某种治疗措施的影响下發生的皮層动力学的变化，作者曾經利用了其他實驗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所謂联想實驗，快速思考 實驗——таксистоскопическоеисследование，校正法)，并作了必要的增补与改良。对于研究兒童來說，特別是幼童，我們同样曾为研究运动-食物性条件反应和朝向条件反应而拟訂了一些方法和仪器。最后为了研究心臟血管条件反应我們實驗室曾拟訂用眼心反射作为非条件反射的方法(科特里亞列甫斯基)。

我們結合各种方法来同时研究运动的、語詞的和植物性的反应时，在皮層动力学及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統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中，为临床診斷和預后(法捷耶娃)或为估計治疗效果(斯特列尔丘克，加爾茨什坦，謝列基娜等等)寻找根据。

同样应当指出，某些精神病学家和神經病学家早就力求在巴甫洛夫實驗室內 形成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中寻找对各种临床病象或个别症狀的解釋。曾有人試圖用这种方法 来了解恐怖症、各种歇斯底里綜合病征，妄想狂状态等的發病学的神經机制(阿薩季阿尼，別赫切列夫，奧西波夫，布魯納烏，連茨，比爾曼，伊万諾夫-斯莫連斯基等等)。

必須強調指出，使用巴甫洛夫学派在动物身上获得的、用来解釋 某些 临幊事实的實驗資料，与神經和精神病人的實驗和临床研究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相反，是彼此間相互补充的。

对病人的临床研究和他們的高級神經活動(特別是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統相互作用的失調)的實驗研究無論如何也不会相互矛盾或者彼此取消的。对于利用巴甫洛夫及其無数弟子們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極丰富的實驗材料，特别是对于使精神病学和神經病学提到 無可比拟的更高阶段的、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的临床病理生理資料來說，也是这样的。

* * *

(註) 用这种方法也在其他實驗室——莫斯科、列寧格勒、哈尔科夫等地进行了許多研究。

踏實而熟思地研究巴甫洛夫的著作在目前成為每一个神經病学家和每一个精神病学家的責任了。如果所說的首先是涉及到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那末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認為就仅仅限于这点。必須細心地研究巴甫洛夫更早期的著作，它揭示了巴甫洛夫生理學的最主要的原则，揭示了他在生理學、病理生理學和實驗治療學的相互關係方面的方針，以及他的生理學研究的生物學基礎。這些研究與現代祖國米丘林的生物學有著親緣的關係，其次也指出了巴甫洛夫科學思想的發展，而由於這些科學思想，致使他確信生理學與醫學的不可分離性。

不了解、不仔細地研究巴氏的全部著作，特別在中樞神經系統高級部位的生理學和病理生理學方面的著作，就不可能完全掌握客觀的神經動力學研究方法以及實驗和觀察的相當的方法，同時不能將巴甫洛夫的科學思想富有成果地用來解決神經病和精神病臨床上的任務，及用來研究和治療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

巴甫洛夫全部科學著作的最主要的主要動機首先就是它的基本的生物學立場，即關於機體與環境統一的概念，關於機體與周圍環境不斷變化的平衡和相互作用的概念，關於機體為一完整動力系統的概念，關於機體一切內外活動，以及精神與軀體活動的機能統一性的概念，關於後天獲得的反應在許多代後能轉為遺傳的反應的概念，關於在自然歷史和進化方面研究機體一切生命活動的必要性的概念。

大家知道，巴甫洛夫科學著作的基本的最特有的思想之一，就是關於在生理條件下，特別是在保護機體免受有害因子損傷時，神經系統起主要作用的思想，以及關於高級神經活動失調在發生和發展神經精神性的和軀體性的病理狀態上的巨大意義的思想；換言之即在生理學以及病理學中的神經論的思想。這一思想在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中達到了它最高的發展。

同樣不能忽視在巴甫洛夫科學活動的一切階段中所特有的，關於正常生理學、病理生理學和實驗治療學之間緊密聯繫的概念，不能忽視由於巴甫洛夫不斷地渴望提出科學的預見、控制生理的和病理的過程、掌握和管理它們、尋求指導和改變這些過程的可能性而產生的概念，以及不可忽視必然會引起“就深刻的意义上來了解，生理學與醫學是不可分離的”（巴甫洛夫）這種想法的概念。

由此巴甫洛夫研究方法的基本特點就成為可以了解的了，即是始終不變地偏重於實驗性研究的被動觀察，而這種實驗研究提供了掌握所研究的現象的可能性。

廣義的講，僅僅在巴甫洛夫學說這些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則的基礎上，方有可能掌握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和病理生理學的臨床。

* * *

敘述了所有上面這些材料後，巴甫洛夫在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領域內科學思想發展的基本道路，在這篇文章內表現為以下數點。

細心地研究在動物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方面的實驗資料和這些資料的綜合，對在神經病和精神病臨牀上理解神經機制和提出發病學治療的措施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不僅僅限於這些。進行動物的實驗研究，在動物身上製成各種綜合病徵和各種疾病的模型，探究對這些由人工獲得的病理狀態的治療，即對實驗治療學的研究，所有這些給研究和治療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的工作以很大的益處。然而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記，為了使這些研究獲得成功的結果，則無可指責地掌握客觀神經動力學的方法和研究動物大腦半球功能的方法，是必需的前提。同樣任

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記，当把这些資料运用到临幊上时应当充分地考慮到人类高級神經活動在質上的特点。

在神經病和神經精神病临幊上运用客觀的神經动力學的方法基本上有兩条道路：第一，可以用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實驗資料來解釋临幊診察和觀察病人的資料，然而必須考慮到人类腦的活動的特点，即是如巴甫洛夫在他的临幊工作中所經常考慮的那样。不言而喻，当这样来研究病人时，首先尽可能地利用巴甫洛夫在高級神經活動临幊病理生理學方面所發表的著作，这些著作給各种临幊病象以神經动力學的解釋，并帮助選擇治疗方法。第二，如我們已經談过的，病人高級神經活動失調可以用實驗的方法來研究，而所获得的資料又能够利用來对疾病的临幊表現作病理生理學的理解和解釋及利用來作为疾病的發病學治疗的根据。

显然这两种研究道路，絕不相互矛盾，而且相反能彼此相互益彰。

建筑在巴甫洛夫學說上的神經病和精神病的病理生理學研究，揭露了作为这些疾病基础的兴奋和抑制过程强度的失調，均衡性的失調（一过程对另一过程佔病理性优势），活动性的失調（病理的灵活性或病理惰性），睡眠和覺醒的失調（通常伴随着所謂时相状态，即催眠相，睡眠和覺醒間的过渡状态的發生）。这些研究揭露了不仅仅是皮層活動的各种失調，而且也是皮層下活動的各种失調，不仅仅是皮層和皮層下部位間动力學相互关系的失調，而且也是腦干各層間动力學相互关系的失調。它揭露了植物內臟机能的中樞神經調節的各种失調，这对于理解神經病學以及精神病學中的許多临幊病相是特別重要的。这一研究揭示了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統協同活動和相互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失調。它促使产生了关于正常的和病理失調的新的机能动力定位學說。同时它帮助在疾病的病象中把病理現象（根据字的本意）与神經系統的保护性反应区别开来，而后者是必須尽可能地加強的。

建筑在巴甫洛夫學說上的病理生理學研究促进对疾病病因學和發病學的神經机制的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对診斷和預后方面也有所帮助，帮助了对治疗措施的效果的客觀估价和檢查，最后并导致制定發病學治疗的方法，以及在巴甫洛夫學說的基础上重新审訂医疗機構的一切常規、病人的护理和监督、以及这些機構中的一切內部組織和規則。

对于参加这一新的領域——还需要进行許多工作的領域，实际地把巴甫洛夫的科学思想应用來解决神經病和精神病临幊的任务的領域——的研究者來說，在其面前展开了为了人民的福利和祖国医学的利益而进一步發展偉大的巴甫洛夫學說的無限远景。

（李心天譯 譚德培校 伍正誼審）

精神病理現象的神經动力學分析

原載“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1952年第3期

祖拉巴施維里（А. Д. Зурабашвили）（梯比里斯）

神經系統的进化形态學与生理學，充实了我們关于大腦机能与結構的概念，它首先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研究。必須用这个情况來解釋下面这个事實：进化的研究方法在任何地方从来沒

有像在苏联那样努力地貫徹到临床工作中去。

無疑的，皮層裝置和皮層下結構的机能表現的發展(进化)和逆行發展(退化)都决定于机体的种族和个体的形成时期中基本神經過程的复杂动力变化。

根据巴甫洛夫的意見，在整个个体中可以区分出一定的發生程序，一定的阶段性，一定的机能層次性(皮層下部的活动、第一信号系統、第二信号系統)。

历史要求公正地強調指出：外国文献中坚持一个觀點，認為建立神經机能阶段性學說的光榮似乎是屬於杰克遜(Jackson)的，这是絕對錯誤的。

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个体机能表現具有不同水平(或等級)的是俄罗斯和世界生理学的泰斗謝切諾夫。謝切諾夫关于直接印象和“印象的語言象征化”的原理，在他的經典著作“思想要素”中获得發展，这条原理乃是巴甫洛夫关于信号系統的天才學說的出色的、創造性的雛型。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杰克遜及其后繼者在方法学及一般科学的原則上有严重的缺点。杰克遜关于阶段性的學說以及关于精神神經机能的进化和退化的學說，陷入了靜止的、狹隘定位的形态学的困境中。

与精神形态論和狹隘定位論一样，外国心理学者們和精神神經病学者們認為精神裝置有三級的思想也是錯誤的。他們的三級是：第一或下層——軀体性心理(соматопсихика)，第二或中間層——情感性心理(тимопсихика)，第三或上層——理智性心理(сопропсихика)。

根据外国学者們的概念，軀体性心理(即植物性心理——бегоопсихика)，以及情感性心理(即意向与情緒的心理)，是与間腦、丘腦-丘腦下部有联系的。仅仅理智性心理与中樞神經系統的上層与皮層有关。

上述理論的伪科学性和荒謬性对苏联讀者更为清楚。

像讓奈(Pierre Janet)这样傑出的資产阶级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的觀點在科学上同样是錯誤的。讓奈也信奉主觀心理学的原則，他把人的最終的个性看成是各个生命阶段机械地重叠而成的复杂結構。

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在进化的生物学，特別是进化的生理学中开辟了新的紀元。巴甫洛夫对于人类高級神經活動規律性所采取的广泛的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来对人在正常时及病理状态下的行为作出非常新颖的、进化的分析。从巴甫洛夫时期开始，进化的神經病學便被建筑在先进的、創造性的自然科学的巩固基础上了。

与达尔文学說的生存競爭原則相反，巴甫洛夫提出了关于机体对于外界条件适应可能性的进化的自然-历史原則。

根据烏赫托姆斯基的意見[17]，巴甫洛夫學說中最重要的并最受欢迎的思想是：“反射裝置的工作不是原地踏步不前，而是随着时间的前进經常获得改造。”

巴甫洛夫关于高級与低級神經活動的學說系根据皮層与皮層下部机能的种族与个体發育的进化原則而創立的。关于信号系統(第一与第二)的學說是人类高級神經活動存在着不同进化阶段的極好的証据。

應該強調指出：兩個信号系統乃是皮層神經动力過程的基础，自然，这些過程并非沒有相应的結構前提。并且对于在第二信号系統水平上的机能表現來說，“也应该具有对这些机能有特别巨大的意义的区域(‘相应刺激的高級分析与綜合的地点’)，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第一

信号系統的‘核心’，因此在結構上自然要复杂得多”（費利蒙諾夫[19,519頁]）。

無疑的，高級神經活動的進化是與整個皮層裝置及其精細結構的進化處於辯証統一之中。根據費利蒙諾夫的意見，在人類，“大約整個半球表面的96%是新皮層”[19,512頁]。

大腦半球皮層的種族與個體的進化不僅限於腦質分量的增加。人類皮層惹人注目的是細胞間聯繫的丰富性與多樣性[4]。

我們認為可以設想：正是細胞間聯繩（即軸突細胞體系統與軸突樹突系統）應該在結構上形成那個“傳遞裝置”，而那個“傳遞裝置”在皮層中發生病態時可以引致基本神經活動過程的阻斷或倒錯。

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指出了“傳遞裝置”的動力意義，以及在其中發生病理變化的可能性[8,134頁]。法捷耶娃[8]也指出：“負誘導現象發生在各種情況中，發生在各種神經道路中。”顯然，神經通路在這裡不僅是說大腦皮層各機能灶間存在着動力性聯繫，而且也存在着動力-結構性的聯繫。

在精神神經病學中運用關於人類神經活動進化的材料有助於闡明疾病症狀的向前發展和逆行發展的機制。

如所週知，言語的發展，即詞的信號作用的出現，乃是大腦半球皮層機能活動在種族與個體形成（完善過程！）中的最偉大的一個階段。正是從這個階段起出現了人類獨有的附加物——第二信號系統，它是第一信號系統的新動力的“非常附加物”。

動物在外界環境中的定向能力只限於第一信號系統，在這個水平上幾乎只有條件-非條件聯繫的接通，而第二信號系統（借助於詞，即“信號的信號”）則構成了人類高級機能（抽象思維）的物質基礎。在第二信號系統的水平上形成了無數的條件-條件性的聯繩。

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5]早在1928年就區分出了與條件-非條件性反應對立的條件-條件性聯繩，同時條件-條件性聯繩的接通，“不是借助於非條件反射而發生的，而是借助於在個體發展過程中獲得的詞和與其相適應的運動之間的聯繩，以及在詞的指示和與此相當的反應之間的聯繩而發生的”[11]。

根據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及其同事（辛克維奇，謝列基娜，斯特列爾邱克，法捷耶娃等）的材料，在信號系統的個體發生中可以看到下述相繼出現的四種類型的條件聯繩，就是：

直一直型（直接刺激物——直接的應答性條件反應）；

直一詞型（直接刺激物——詞的應答性條件反應）；

詞一直型（詞的刺激物——直接的應答性條件反應）；

詞一詞型（詞的刺激物和詞的應答性條件反應）。

顯然，第一類型條件聯繩是在第一信號系統活動能力水平上接通的；第二和第三類型需要兩個信號系統的機能作用相互動力性的銜接；第四類型的條件聯繩主要是在第二信號系統的水平上發生的。

值得注意的情況是：第二信號系統本身表現出最原始的和最高級的反應形式階段。換句話說，在第二信號系統的個體發生中，可以劃分出詞的反應的發展的各個階段。

讓我們來看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所寫的吧：“從機能-發生學方面來研究詞的反應時，我們認為模彷言語、同音反應和疑問反應的表現乃是較為高級的言語形式被抑制的表現，同時看

到皮層的兴奋轉向于在个体發生中較早的接通路徑。無疑地，持續言語（就是‘滯留’于再三重複的同一詞）也證明了言語联系的抑制……最后，熟記的詞組也屬於应答性反应的低級形式：如諺語、引用文、常用的形容詞等等。但是，在所有的应答形式中，最原始的乃是詞刺激物的單純重复，也就是模仿言語的反应。

巴甫洛夫認為：最基本的和个体發育中最早的詞的联系乃是詞在大腦皮層中的听覺痕跡与动覺运动性痕跡的联系。”[8,135頁]

对于人的行为來說，第二信号系統是主导的，也就是特別佔优势的重要的系統，并且根据巴甫洛夫的意見，信号系統分为第一与第二兩系統決不是簡單的解剖学上的区分，而是机能动力上的区分。

由于第二信号系統在种族發育上是較为年輕的，在結構上是較为复杂的，和在机能上是較为重要的，并容易遭受外界各种有害影响的致病作用的伤害，因此与第一信号系統比較起来，第二信号系統乃是較为脆弱的和容易受伤的。

在病理情况下，当第二信号系統的調節影响減少或完全消失的时候，就产生了条件，促使第一信号系統發生無組織的紊乱的活动，它“再不理會或很少理會实际情况，而主要是服从皮層下部的情緒性影响”（巴甫洛夫語[13]）。

在斯大林关于語言學的天才著作發表以后，对于巴甫洛夫的生理學引起了更大的兴趣，而巴甫洛夫关于第二信号系統的觀念本身，需要在斯大林关于語言的天才學說的指示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創造性發展。

根据斯大林的語言學說我們深信：語言与思維是不可分割的，沒有赤裸裸的、脱离語言材料的思維；沒有語言的思維是不存在的，沒有思想內容的語言也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还天才地解决了病理状态下，即聾啞人的思維与語言的問題，他們缺乏語言的材料即語言的机能。

無疑的，聾啞人的思維能力显然是有限的并有缺陷。虽然如此，除了严重的精神發育不全之外，聾啞人还是有人类特有的高級思維的；他們并不缺乏抽象的能力。

現在，根据斯大林关于語言的學說和巴甫洛夫关于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我們得到下面这条原理：高級思維过程仅仅是人类所特有的，就是說高級的概括与抽象仅發生在第二信号系統的水平上和范圍內。既然聾啞症患者具有思維的能力，因而可以認為：在某些情况下，思維可以在語言材料之外进行（因为聾啞症患者沒有語言和言語），在痕跡（形象、知覺、表象）的基础上进行，这些痕跡系外感受性刺激（視覺、嗅覺、味覺、触覺）遺留在大腦裝置里面的。

患精神病时，正如巴甫洛夫本人所強調的那样，除了極少数的例外（严重的癡呆及完全的意識模糊），兩個信号系統的活动和相互关系發生病态，而在大多数的病例中，第二信号系統的动力作用并未完全消失。

巴甫洛夫曾就歇斯底里、精神衰弱和各种催眠时相状态时，第一与第二信号系統之間的动力相互关系問題提出經典式的見解。

伊万諾夫-斯莫連斯基及其同事在各种神經-精神疾患时的信号系統病理动力學的研究領域中进行了巨大的研究工作，如精神分裂症、反应性抑郁症、强迫性神經官能症、癲癇、酒精中毒性精神病、人腦創伤性疾患和兒童的一般神經官能症。

根據他們的觀察，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的失調不僅表現這兩個基本皮層系統中的某一個對另一個佔優勢的現象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它們的協同活動的各種形式的分裂上，這時協同活動常常表現出一種向已經經歷過的進化階段發生退化的傾向。

“首先在一個信號系統中發生的病理失調，通常也在另一系統的活動中獲得某種反映。

當情緒性、外傷性、消耗性以及中毒性的因素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高級部位時，在第二信號系統中首先發生保護性抑制的現象，且歷時最長，破壞兩個系統的相互作用和逐漸傳播到第一信號系統中去；此時可以分別地或同時地在兩個系統中看到醒覺與睡眠之間的過渡的中間狀態（時相現象）。

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病理變化通常出現於大腦皮層與中樞神經系統低級部位之間的相互關係失調的背景上，也出現於多多少少是明顯的植物性改變的背景上。”（註）

顯然，在所有的場合中，病原因素作用於個體的兩個信號系統，並破壞它們的正常的相互作用與相互關係。同時應該牢記：在精神創傷因素一次或多次作用時，第二信號系統被抑制，甚至暫時失去作用，隨之而有第一信號系統的釋放與增強。

持續的不愉快的個人情緒體驗的存在可引起病理的“不安”和第二信號系統活動能力的病態過度緊張，此時，第二信號系統被動員來分析和深思熟慮個體周圍發生的困難而嚴重的情況。

對精神病理現象加以神經力學的分析時，確定保護性抑制定位在什麼水平上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在論到精神分裂症的不言症的特徵時，寫道：“如果說在有些情況下抑制最初發生於皮層下部，發生於丘腦紋狀體蒼白球系統，發生於最簡單的非條件發聲的反射中，並由此擴展到整個語言的皮層性上層結構的話；那麼，在另一些情況下，抑制大概是先在語言的皮層性上層結構中發展起來，局限在皮層中，或者還向下擴散到皮層下部。”[7]

在同樣的疾病中，例如在慢性酒精中毒時，時相現象（即保護性抑制）可以發生在高級神經活動的各個不同的階段中：或是在兩個信號系統中（辛克維奇[14]；斯特列爾邱克[15]），或是只在第一信號系統中，或只在第二信號系統中（辛克維奇[14]）。

抑制過程沿着大腦活力的縱軸運動，不僅限於皮層或最鄰近的皮層下部；它還可以波及到遠處的腦干平面。緊張性昏睡的神經活力特性便是上述說法的例証，在緊張性昏睡中，“抑制過程從腦干的某些平面向上或向下轉移到另一些平面，顯然是與各種不動症的相互轉移是相應的”（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6]）。

我們看到，在大腦的非條件反射活動中，令人注意到各種活力水平，皮層下機能可以在這種水平的基礎上發生抑制。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時的最簡單的非條件反射時（朝向反射與防禦反射），納爾布托維奇和斯維特洛夫得出下述結論：“眼瞼閉合是最古老的反應，最後發生抑制；而表情反應是最年輕的反應，首先發生抑制。”[12]

根據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的材料，兩個信號系統的參與不僅決定著幻覺表現的特點，而且也決定著妄想表現特點。

（註）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患某些神經精神病時大腦皮層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的病理失調，報告提綱曾在1950年6月12日在梯比里斯城召開的格魯吉亞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保健部阿薩季阿尼（Асатиани）精神病學研究所擴大科學會議上提出。

第一信号系統中的病理惰性产生形象的幻覺，而第二信号系統中的病理惰性产生詞的幻覺，病理惰性在兩個信号系統中存在時，則產生複雜的形象-詞的幻覺。“但是，幻覺的基礎並不是在所有的病例中都是興奮過程的病理惰性現象”[10]。

談到妄想的概念，它可能帶有主要是形象的、表象的性質，或者是口頭的、詞的性質，“決定於主要損害是在直接投射——第一信号系統或在象徵的第二信号系統投射”[9]。

塔塔連柯[16]根據惰性興奮灶發生在大腦皮層什麼樣的系統和結構中認為：在妄想狂時病理狀態發生於第二信号系統區域，在疑病症時，病理狀態主要發生在第一信号系統區域，而在強迫現象時，病理狀態不僅發生在皮層系統中，而且在皮層下部也可發生。

蘇維埃神經生理學家與精神神經病理學家的資料（伊萬諾夫-斯莫連斯基的研究最早），使我們得出下面這條原理：基本神經過程（興奮與抑制）的動力水平（即階段性）決定著精神病症狀的轉化。

機能的進化分析在實驗性治療的材料中具有特別的興趣，在實驗性治療時，可以親眼看到臨床症狀向前發展以及逆行發展的情況。

如所週知，精神病的治療資料已成為資產階級精神病學家們的偽科學解釋的對象。

他們忽視了皮層神經動力主導意義的重要性，從精神分析或粗暴的機械論點出發來討論恢復的機制。只要指出艾爾納斯·格爾荷恩（Ernest Gellhorn）所說的話就夠了，他說：“交感神經系統中樞的長期興奮可以使自主神經系統失調的平衡恢復並對大腦皮層本身給以深遠的影響。”[1]

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也為臨床治療材料的分析與綜合提供了創造性發展的道路。

讓我們很簡單的談一下在用胰島素治療精神分裂症時精神病理現象的神經動力基礎。應該強調指出：胰島素治療所引起的臨床變化的動力學可以在巴甫洛夫學派關於睡眠性抑制從皮層到皮層下部位，或是相反從皮層下部位到皮層的運動的概念的指導下加以分析。

我們領導的精神病學研究所的同事高布羅尼則[2]完成了關於精神分裂症胰島素休克治療的淵博的專記。他的材料包括600個臨床病例，如果按照在胰島素治療過程中每個病人將近有40次的低血糖狀態，那麼他的材料就有數達24000次的實驗性觀察。

根據作者的意見，在實驗性低血糖狀態中，有著各種各樣的臨床症狀。在每一個具體病例中，這些症狀的出現具有某種順序性，在這裡好像遵守著一定的“階段性”。這種“階段性”在精神病症狀顯露及逆行發展的時候都有。

他所描述的意識障礙的各種臨床表現（輕度遲鈍、遲鈍、嚴重遲鈍、意識混濁、類睡眠狀態、昏睡和低血糖休克或昏迷，即意識完全喪失）應該是兩個信号系統的不同程度的抑制，以及皮層與最鄰近的皮層下部位的不同深度的抑制所決定的。

在胰島素治療時，高布羅尼則認為植物性症狀是臨床表現形式之一種（多汗、寒戰、体温顯著下降、血管運動現象等等）。胰島素治療時植物性病變的臨床表現的加劇可以看成是皮層對間腦，首先是对丘腦下部的正誘導。

進化神經動力學分析的原則對於癡呆的臨床症候羣來說也是值得注意的。在這方面，精神發育不全性的癡呆佔著特殊的地位，此時第二信号系統的各个不同的阶段，也就是說，它